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十论

目 录

总 序	1
1、国际经济新趋势与我们面临的新挑战	2
2、首先要重视发挥“现实的竞争力”	10
3、利用比较优势与利用“适当的技术”	16
4、新经济与旧经济：新经传统产业在中国仍大有可为	21
5、创新与引进：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快的科技进步	28
6、要素流动与地区差距的缩小	33
7、城市化：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中心环节	39
8、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的出路在于非农产业化	44
9、发展民间金融与金融体制改革	48
10、体制改革、宏观调节与长期增长	56

总 序

在新技术革命加速进行、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关注着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和发展。外国人关注“中国还能否继续高速增长”；而我们的企业在问“加入 WTO 后我们究竟怎样才能生存和发展”？世界经济的逻辑是“弱肉强食”，中国的强大是一些人所不希望看到的，历来如此，从来如此，而不是因为我们有些人刚刚意识到这个道理才是这样。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任何退路，我们必须继续以比发达国家更高的速度增长，否则我们就不能解决各种各样因为落后于人而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就可能失去在新的世纪赶上世界强国、成为国际舞台上平等的一个成员的最后机会。因此，我们要深入而客观地研究：新的形势下我们会面对哪些新的问题和困难，我们在国际国内的竞争力究竟在什么地方？如何才能根据我们的特定国情、特定环境和特定的发展阶段，制定适当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利用我们自己的特有优势，少走弯路、少犯错误，使中国经济再能有 20 - 30 年的高速增长？

正是出于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目的，笔者试图以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对与中国当前和下一阶段经济发展战略有关的 10 个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国际经济新趋势与我们面临的新挑战

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重要的趋势：新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的市场化。所有这些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追赶上发达国家的新机遇，也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这些新的趋势的出现可能使它们追赶发达国家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使世界中贫富差距拉大的可能性加大。

正因如此，在思考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发展战略的时候，我们必须对国际环境变化可能导致的影响及后果，进行充分深入的分析，以确定真正有效的对策。在中国经济扩大开放、走向国际的今天，我们的很多“政策结论”都必须建立在这些分析之上。

1、技术革命

90年代以来的信息 - 网络技术革命，统称为“数字革命”，已经大大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格局，而这一革命本身还正在进行，远没有结束，18个月一代新芯片的“莫尔定律”仍然有效；无线通讯与网络的连接技术正在迅速形成；网络与实业的结合和“网络公司”的兼并整合刚刚开始，资本市场上与网络技术相关的波动刚刚经历了“第一个回合”。

而人们现在还感受不深、但未来影响可能更大的另一个技术革命即“基因革命”，也正在悄悄地发生。2000年春天人类已经获得了完整的果蝇的基因密码谱；到2000年底，人类就可能获得人类的全部基因密码谱的初稿（这很可能是由一个名叫赛利拉的私人公司首先完成）。网络革命还仅仅是改变人们获得信息的方式，而基因革命将彻底改变人类

的生活本身，以及与这生活相关的农业、食品业、能源工业、医药工业以及几乎所有与人的生活相关的经济产业！

技术革命的发生不仅对全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也为落后国家的发展和赶超，提供了新的机遇。这是因为，新的技术取代旧的技术，使得落后国家不必重走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而是可以在较新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较迅速地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长期看，知识和技术所能产生的“外溢效应”，可以使我们更多地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更大的竞争力。

但是，在另一方面，技术革命也可能使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这里关键的两个问题是，第一，现在正在发生的技术革命都首先发生在发达国家，它们首先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首先在市场上占居了优势（想一想网络技术的发展情况）。发展中国家因为还不具备国际领先的技术创新能力（这是它们与发达国家的根本性差别），还无法获得这种优势。第二，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可能不具备应用新技术的各方面条件。以现在的网络技术的应用为例，发展中国家可能因以下几方面条件的缺乏而处于劣势：A. 不具备广泛应用电脑和网络的教育水平；B. 缺乏电信、金融、商业等基础设施和基础条件，比如因没有信用卡而无法进行网上支付，因缺乏物流配送条件而难以开展网上交易，因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而难以开展风险投资和为新创企业的发展筹集资金，等等。C. 在现代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下，由于新技术不是自己发明的，在利用时要支付更高的技术使用费或技术转让费。而且，技术一旦发明出来，在专利保护时期，它们越是被（发展中国家）广为应用，赢利就越大。D. 由于发达国家可以支付更高的工资，提供更好的研究与市场条件，使发达国家可以更多地吸引人才，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发生人才流失，使技术进步导致的差距在一定时期内更加扩大而不是缩小。

2、经济全球化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货物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程度提高的过程。它在几百年前就已经以各种方式开始，只不过在最近一些年中速度大大加快了，而且特别是生产要素的流动速度加快了。

那么，什么样的生产要素可以流动呢？资本和技术当然是可以流动的；劳动力也是可以流动的，但是，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只有拥有知识和技术的“人才”是可以流动的，一般的劳动力基本上是不允许流动的（“签证拒签”），这是发达国家一些鼓吹全球化的人士们讳莫如深的一个问题。至于其他生产要素如土地和自然环境当然是无法实现流动的，“偏远地区”仍然是资本和技术难以进入的。

考虑到过去二、三百年内国际贸易已经在逐步扩大的事实，那么可以说，最近一、二十年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就是资本以及体现在资本中的技术的流动性的增大和配置效率的提高。这里的资本要素，既包括进行直接投资的产业资本，也包括了各种各样的金融资本。

资本要素流动的范围和速度的提高，毫无疑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因为发展中国家即使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开始的时候缺乏的也是资本和技术。当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适合生产”也就是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场所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生产要素就有了实际进入生产的机会（失业的人只是潜在的生产要素），一些比较优势才得以发挥，发展进程才得以开始和持续。如果没有经济开放，引进外资，引进技术，中国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所以，积极加入全球化进程，是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而且，全球化无论如何都在进行，你不积极地参与和利用它，只能被它所淘汰。

但是，经济全球化本身并不一定就使发展中国家要想追赶上发达国

家的任务变得更加容易，它也许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全球化也可能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而不是缩小。

理论上说，自愿的交易（要素的自愿流动和组合也是一种自愿交易）可以导致交易双方经济利益的改善。落后国家在国际贸易和外资流动中当然也是可以获益的，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就说明了这一点。但问题在于，交易所带来的好处（理论上所说的“消费者剩余”），在交易双方的分配比例，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而在很多情况下，占有优势地位的一方（强国、跨国公司等），会获得较大的份额，较弱的一方则只获得较小的份额，从而使双方的差距拉大。

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资本在全球的流动性加大和资本效率的提高，而资本效率提高的主要受益者显然首先是资本所有者，是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资本的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资本流动性的加大，当然使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多地利用资本，特别是直接投资。但是由于资本市场不发展，法制体系不健全，缺乏人才和经验，缺乏对资本市场有效的管理，以及所有其他体制方面与成熟的市场体系之间的差距，它们容易受资本市场风险的冲击，而较难从中获得较大的收益。即使仅就直接投资而言，在手持资本、四处选择，待价而沽的跨国公司与多一点就业总比少一点就业好的落后国家之间，谈判地位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对于落后国家的人们来说，真正的悖论在于：不开放，不利用外资，不加入全球化，你的发展速度更慢；而利用外资本身，并不一定能缩小你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亚洲金融危机，美元的长期坚挺，美国资本市场的持续强劲攀升，欧美经济的持续增长，世界范围内利息率和资本收益率长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美国经济在 1999 年的第四季度增长率达到 7.1%，比中国的增长率都高，都说明了全球化可能使富人更富。在这过程中，穷人用绝对

收入指标衡量可能也会变得富了一些，但相对而言，差距可能反倒扩大了，追赶起来更加难了。亚洲危机中那些饱尝过早开放金融市场之苦、大量财富被资本流动“卷走”的国家甚至还会出现富裕程度绝对下降的情况，尽管比起 20 年前他们的收入水平还是提高了。

3、全球的市场化

在人们较多地谈论经济和市场的全球化的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更值得重视的一个趋势是全球经济的市场化。因为这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国际市场条件恶化而不是好转。

所谓“全球的市场化”指的主要是自 90 年代初以来，全球大部分国家都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首先是苏联 - 东欧国家旧体制的解体，开始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缩小政府开支，硬化预算约束；其次，所有发达国家也都加快了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减少政府开支，消灭预算赤字（现在像瑞典、美国这样的国家都出现了大额预算盈余），减少税收，增加企业活力。最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从亚洲到拉美，也都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提高效率，增加利润，增加供给，减少政府干预，压缩公共支出，平衡国际收支。

所有这些体制改革（再加上同时发生的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导致了一方面国际市场上供给迅速增大，成本持续下跌，另一方面则是需求增长速度的相对放慢。私人企业因追求利润而控制工资及其他成本支出的增加，而政府则从过去的财政赤字（“花的比收的多”）转变为财政盈余（“收的比花的少”）。结果，便出现了近几年我们所见到的全世界生产能力特别是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普遍过剩；全球市场从过去 50 - 60 年“通货膨胀”（以及“滞胀”），转变为面对日益明显的通货紧缩压力。亚洲金融、经济危机其实不过是这一全球现象的一个表现，甚至可能是

一个“起点”，标志着全球经济从此进入（“回归”）周期性生产过剩的新阶段。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经济的市场化当然提供了机遇，因为全球的市场化，意味着市场范围的扩大，我们如果在一些方面拥有竞争力，就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它，以促进我们的发展。

但是，在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坏消息，因为一个较宽松的市场环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资本积累是有利的，而一个面临通货紧缩压力的、日趋“拥挤”的国际市场，显然是不利的。

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国际市场中，发展中国家能够进入的那一部分，即技术、资本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市场，由于一大批亚洲、拉美和东欧国家的进入而已经变得特别“拥挤”，竞争格外激烈（包括竞相压价），这就使所有这些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处在更加不利的地位。

这些都表明，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我们所面对的国际市场条件，可能都不如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那么好。日本和“四小龙”当年以“出口带动”的经济起飞所面临的那种相对宽松的国际市场环境，对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是难以重现了。我们中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可能也要面对贸易顺差逐步缩小的现实；像过去 20 年中许多时候净出口的增长本身可以贡献几个百分点的 GDP 增长，那种情况也是难以再现了。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

4、新形势与老问题：落后国家如何能增长得更快一些

需要十分明确的是，以上的分析是对事实的确认，丝毫不意味着我们要反对技术进步、反对全球化、反对市场化。反对任何进步的事物只

会使自己变得反动，而不会使自己进步；抱怨别人如何强大，不能改变自己的弱小。抱怨发达国家占优势、占便宜、欺负人，也于事无补，因为天下的逻辑本来就是“弱肉强食”，从古至今，历来如此，认识到这一点只是回到常识，而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新发现”。应该做的只是认真思考自己如何也变得强大。那么，分析以上问题可以得出的“政策结论”是什么呢？

首先，以上的分析表明，在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并没有改变，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没有因为新技术和全球化的出现而自动缩小，相反，新的形势下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有扩大的可能。我们过去 20 年的高增长使我们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别人也在进步，新的形势下又出现了导致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新的可能性。所以说，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问题**，即如何在“处处不如人”的条件下还得比人家增长得更快。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一方面客观准确地分析我们所面对的形势，另一方面客观而准确地分析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并在这种对现实的充分认识、分析的基础上寻找能使我们真正发展起来、缩小差距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少走弯路，少拿宝贵的资源去“打水漂”，少去追求那些不切实际、实现不了而又代价昂贵的所谓发展战略。我们自己的历史已经证明，那些幻想我们现在就可以在“高新科技”、资本密集型产业等领域成为国际竞争的强手的所谓“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只能最终导致增长速度放慢、差距最终拉大而不是缩小。我们现在的人均 GDP 是 800 美元左右，世界上最高的人均 GDP 是瑞士的 4 万美元（美国是 3 万美元）。它只要增长 2% 就增长出一个 800 美元。面对这样的差距，我们实在是再经不起折腾，再经不起弯路，再经不起各种浪费资源、降低效率的“跃进”了。

其次，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尽可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使其更加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争取在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中，获得更大的份额，尽管这不能代替我们自己加速改革与发展和使自己在各方面都更加强大的努力。

首先要重视发挥“现实的竞争力”

加入 WTO、全球化、科技革命、知识经济……，所有这些听起来之所以既让人觉得刺激又让人觉得恐惧，是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竞争——更加激烈的竞争；而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在于：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经济、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在什么地方？

1、应该怎样才能最终赶上发达国家

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弱小企业与国际大公司相比，竞争力较低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技，即科技开发能力与技术装备水平，从国家的角度看还包括教育与基础科学研究能力。科技能力高，效率就高，成本也就更低。

第二，人才，既包括技术人才，也包括管理人才，还包括熟练工人。在一定程度上，“人才”因素与“科技”因素有重合的部分，因为人才是科技能力的载体。但人才还包括的是管理能力和市场经验。拥有几百年市场竞争经验和企业管理经验的国家和企业，显然占居优势地位。

第三，资本，雄厚的资本可以经得起竞争的风浪，经得起“先赔后赚”，易于挤垮“小对手”，易于取得垄断地位，资本因素在一定意义上与人才和科技因素相关，因为有钱就能付高工资，引进人才（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引进人才”对于穷国来说就意味着“脑力流失”）；有

钱就能够进行较大力度的科技开发投资，永保优势地位。与资本相关的另一点是“规模”，财力雄厚的企业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规模效益，挤垮弱小的对手。

第四，体制，这包括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一系列的法制结构、企业制度、资本市场、政府规章制度、政府效率等等一切与企业运行效率相关的内部机制与外部环境。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处于弱势。因为它们刚刚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不久，而制度建立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有效的体制，相对于那些市场经济已经搞了300-400年的发达国家来说，当然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从而比较缺乏效率，更易受市场风险的冲击。亚洲金融危机只不过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说，发展中国家要想最终追上发达国家，就应该第一，加速改革体制；第二，加快发展教育；第三，积极培养自己的科研能力；第四，继续努力积累资本，等等，等等。这些“应该”做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大家也都在说这些“应该”。毫无疑问，一旦在将来我们做到了、实现了这些“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就有了“未来的”具有国际水平的竞争力。

2、在“处处不如人”的时候如何能有“现实的竞争力”：发挥“相对优势”

但是以上这些“应该”可以说并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在发展中国家，或者“落后地区”，或者“弱小企业”“处处不如人”的时候，怎么才能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卖得出东西去，能赚到钱、能有利润，开始积累资本、发展基础教育，从而能开始发展壮大，增长速度还得比人家高，以缩小与世界强国和跨国公司的差距？需要认识到的是，落后国家和弱小企业“处处不如人”的情况不仅会在经济发展之

初存在，而且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持续存在——因为差距太大，追赶需要一个过程；同时，你在发展，人家也在进步，还是要处处压着你。也就是说，问题不是看到差距从而看到我们“应该”克服的弱点，而是在于如何在处处不如人的情况下还能有竞争力，而且是国际竞争力！

幸好，“竞争力”并不仅仅意味资本多、技术新、人才多，落后国家、落后地区、弱小企业也可以有竞争力！

为此，我们有必要概括地分析一下“竞争力”这一重要概念的基本内容。

所谓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说到底不过就是企业的这样一种能力：它能以较别人更低的成本，生产出同一种（同一质量）的产品；或者，以同样的成本，生产出比别人更好、性能更多、服务更周到的产品；从而，企业就能够以更低的售价，占有更大的市场，或者，在同样的价格下，赚更多的利润，发展得更快。

而要做到成本相对较低，就不一定只有资本多、技术新才能做到，发展中国家从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出发也可以做到。而这就是要求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以下几种其特有的“相对优势”：

第一种即资源的比较优势。落后国家其他的东西都稀缺（因而利用起来成本较高），至少还有一种东西成本较低，即廉价的劳动力，从而使得这些国家在生产某些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时候，成本较低、竞争力较高。这种优势其实就可以称为“穷的优势”——收入水平低从而劳动成本低，是劣势，也是优势，因为这可以使产品的总成本低而具有竞争力。

第二种称为“落后的优势”（也称“后发优势”）——因为落后，从而可以学习别人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技术、管理与市场经验等等，可以少走弯路，走捷径以缩短差距，用不着处处事事自己花代价发明创造、

从头“试错”。同时，因为落后，就有追赶的动机。发达国家的人们因为在前沿，容易懈怠，而穷人在追到同等富裕水平之前总会有较为充分的激励去努力奋进。

以上是从国家的角度进行分析的。从企业的角度看，还有另一种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利用的相对优势，那就是基于对本国市场的熟悉（也是一种资源即信息存量）的所谓“本土市场优势”，这可以说也是任何落后国家总会具有的一种（初始）资源优势，它指的是对地方市场上的语言、文化、历史传统、人际关系、对本国目前特殊的体制的更多的理解、对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的特殊知识，因而是落后国家的企业所能够利用的一种竞争力优势。我们也可以把这称为“土的优势”。当我们把本国市场也视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事实也已经如此，加入WTO之后就更是如此）的时候，这是本国企业可能拥有的一个重要的优势因素。这可以说是在全球化时代形成的一种特殊发展要素，它不同于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等一般意义上的发展要素。

发展中国家和一个新生企业，最终的目的是要在技术、资本、人才、体制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平起平坐，那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但是在现阶段，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多数地区、多数企业来说，我们的竞争力的源泉，我们要想卖得出去东西赚得着钱，还只能依靠以上三个较为“低级”的发展要素：廉价劳动力、模仿（与引进）和地方特色，就是“穷的优势”、“土的优势”和“落后的优势”。这些可以说就是落后国家的“现实的竞争力”。

我们不会永远“低级”，但要想未来真正走向“高级”，我们必须从“低级”入手，这样才能赚钱，才能积累，才能有钱搞教育，才能逐步搞科研，才能使我们的企业逐步发展壮大，而不是早早被人挤掉、吃掉，才能不断地“进入下一阶段”，而不是被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打断我们

的发展进程。

3、冷静分析现实，脚踏实地前进

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忌讳之一，就是老想一下子变得“高级”。因为看到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如此之大，每个人都着急，都想尽快“跳跃式发展”，尽快缩短差距，结果便不断地生出种种“大跃进”、“洋跃进”、“金融早熟”等等的事来。没有技术买技术，没有资本借资本，这都可能做到，但买来借来的技术和资本都是要付较高代价的；而另一方面人才又没有，体制又不健全，一时半时还不能改变，于是到头来就会陷入危机，走大大的弯路。我们中国人已饱尝这些教训了。而最近的教训来自东南亚危机。东南亚一些国家，为了加速发展，为了更多地引进资本、引进技术，在各方面条件不具备的条件下，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以印尼、泰国为典型），企业也过早、过份地追求“高、新、大”（以韩国为典型），大多数大企业不能赚钱，靠借债维持，结果当年名义上速度很快，金融危机一来，“财富缩水”一大块，统算下来增长率要打一大的折扣，因为走了一个大大的弯路。新的经济形势使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面临发展的“新的紧迫性”，但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千万不能再不吸取经验教训，再搞“冒进”，再拿着宝贵的资源“打水漂”了！“发展的紧迫性”已经不允许我们再走弯路了！

分析以上这些问题，并不是说我们中国现在就绝对地不能搞一些“高、新、大”的东西。我们中国目前经济的结构具有明显的“二元特征”，一方面是大部分地区和企业还较落后，但也有一些企业具备了一些科研能力，也有一些企业具备了向较高级发展阶段过渡的实力，具备了一些搞高新技术主业的能力。因此，中国很可能在较广的产业分布上都取得发展，有条件“两条腿走路”，实行多层次的发展。但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主要的现实竞争力源泉仍是以上分析的一些“相对优势”。我们不能再脱离我们的现实的竞争力源泉，又搞“一窝蜂”、“大干快上”，盲目地追求我们不具备优势的“高新科技”，把大量政府的资源和企业的资源又都引导到一些我们现在还不具备竞争力、不能赢利的项目上去。每个地区、每个城市、每个企业都要马上实行“产业升级”、“结构高级化”，都“大力发展高新科技”，都看不起我们那些“土的”、“低级”的东西，如果就可能是这样：我们不但不能“多层次”，还可能出现“全盘皆输”，想占领的市场没能占领，能占领的市场又丢掉了，不仅丢给了跨国公司，也丢给了与我们直接竞争的那些发展中国家（在另一篇文章中，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为什么对发展中国家和一些企业来说，“适当的技术”即“能赚钱的技术”不一定是“高新科技”）。

在此我们应该发扬的是我们中国人的特殊智慧——扬长避短，循序渐进。经典的例子是“田忌赛马”。在我们每一等级的马都处于劣势的时候，我们只能先用“上马”对其“中马”，中马对其下马（甚至在一定的阶段可能还只是以“上马”才能赢其“下马”），赢了钱养出更好的马，再进入下一阶段的对抗，再不能一开始为了想赢其上马和中马而一路输去。越是人家发展快、差距有所扩大、发展的紧迫感增大的时候，我们还就越是要沉得住气，用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来认真地分析我们的竞争力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卖点”究竟在什么地方。

利用比较优势与利用“适当的技术”

1、为了将来的发展，我们今天必须从现实出发，充分利用比较优势赚钱！

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在收入水平、科技创新能力、产业结构等各个方面赶上和超过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从现在起步，必须能够在今天的国际市场（包括日益成为国际市场的中国本土市场）上“卖得出东西”，我们的企业必须从现在就能赢利，从而能有资本的积累、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科研能力的加强，使经济能持续发展下去。总之，我们现在就得有“竞争力”，而且是国际竞争力。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必须认真思考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竞争力，而不是仅仅设想我们将来“应该有”怎样的竞争力，因为我们现在就必须“挣钱”！而且，为了能够更快地拥有更高级的、“应该有”的竞争力，我们现在必须依靠我们已经拥有的竞争力，因为如果我们现在不能挣钱，将来的一切都是空话！

所以，尽管我们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在资本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强国、成为高新科技的领先者，我们现在却还必须依靠我们的资源比较优势（以及其它一些相对优势），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穷的优势”），还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上进行竞争，也包括在我们自己的市场上（它已经是、更将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事实上，现在我们能国际市场上卖得出去（同时能赢利）

的东西主要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或者是在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某些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上的产品（组装、来料加工等等）。这并不像有人认为是我们的“悲哀”，而是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是我们正确地利用了我们的比较优势。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源泉，将会仍然是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许多相对落后的地区和企业来说，就更是这样。

这丝毫不否定我们中国已经有了一些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也不否定我们今后要逐步发展这样的企业和产业。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就大部分地区、产业和企业来说，我们还必须从现实出发，想想我们干什么才能不亏损，而是能赚钱？！

2、有竞争力的技术不一定是“高新技术”，而是“适当的技术”

如果说上一点还比较容易认识到的话，那么下面一点则需要较深入的分析 and 阐发，这就是：在“高新科技”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情况下，我们如果一味地追求利用“高新科技”，特别是那些本身不需要利用许多劳动力的、自动化程度较高的高新科技，我们的企业往往就会亏损，我们就会不具备国际竞争力！这里的基本道理就在于：一种“高新科技”如果不是我们自己发明创造的，而是由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发明的（据统计，世界上 92% 的最新科技发明发生在发达国家），我们要利用它就要比发达国家或发明它的那个公司至少多支付两笔费用，一是新技术的“专利费”。发明新技术的企业除了要收回它的研发成本之外，还要获取高额的创新利润。它有时体现在先进机器设备的高额创新利润之中。第二，在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为了购买技术所需资金的成本也会比別人更高。这样，我们利用这一技术的资本、技术成本就要比別人高。而如果这一技术本身并不需要利用许多劳动力，我们不能在劳动成本这

一项使总成本有所降低，我们就会要么生产同样的产品而成本比人家高、甚至成本高于市场竞争价格，导致企业亏损；要么售价比人家高而卖不出东西，还是亏损。我们许多企业引进了世界顶尖的高新科技之后陷入长期亏损，其实是必然的；一些企业买进了高新的设备最后也只好闲置不用，可能反倒是对的，因为可能越用越亏损，闲置不用可能还亏得少一些。这些我们长期、反复观察到的现象，是有其经济规律的背景和原因的。

在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或利用高新科技的问题上还应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作为发展中国家，能使这种技术具有经济可行性即能够赢利的各种条件可能还不具备。一国的经济体制、教育水平，职工的技术熟练程度等等，都会构成发展中国家技术密集型产业缺乏竞争力的制约因素。

正因如此，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是“适当的技术”（Proper Technology），其涵义主要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是技术越“高新”越好；在一定的阶段上，由其生产要素、资源禀赋结构和各方面条件所决定，只有某些技术和某些技术构成的产业，对于这个国家或这个企业来说是能够赢利的、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简而言之，“适当的技术”就是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一定成本条件下使企业能够赢利而不是使其亏损的技术。

对于任何企业来说，根本的问题都在于：如果不追求技术进步，就没有明天；而若不能赢利，就连今天也没有，更不用说还有什么明天。如果片面地、绝对地、盲目地去追求“高新技术”，甚至以“高新技术”作为投资项目决策的主要标准，而不是实事求是分析我们的具体条件，并且坚持企业必须以赢利为目的这一基本的经济原则，我们迟早会陷入困境，引发出企业亏损、不良债务增多、金融风险增大等一系列问题。

企业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道理也是一样的。如果大量企业在盲目追求高新科技和技术密集、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的过程中长期亏损，我们的银行体系就会被坏账拖垮，我们早晚会陷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所揭示出来的某些国家（比如韩国）的教训，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

“适当的技术”的概念的优点就在于，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当条件发生变化时，什么是“适当的”本身也就随之发生变化。技术的进步、技术构成的提高、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都是一个过程，而不可能一下子实现我们的梦想。但是当我们有了赢利，资本积累增多，同时开始有钱搞教育、搞研发，同时随着各种技术的应用和生产的发展，使得工人的技术水平逐步提高，我们的“适当的技术”的水平也就会不断提高，最终达到我们自己也能创造出来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水平。

3、为了 9 亿农村人口，也不要排拆劳动密集型产业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那就是扩大就业，早日使我们的 5 亿农业劳动者的绝大部分被吸纳进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来，提高这一大人群的收入水平，以扩大国内市场，使整个国家的发展能够持续下去，既不因市场需求不能尽快扩大而限制增长的速度，更不因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扩大所引发的社会不稳定打断我们的发展进程。如果我们片面地强调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把有限的资源都用于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或许少数企业能够成长，少数科技人才的收入能够迅速提高，但多数劳动力长期不能获得收入较高的就业机会而处于贫困状态，我们会陷入社会危机，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进程就会难以为继。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怎么强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不过份的，包括引进外资发展来料加工业。就许多来料加工业来说，我们的确不能

获得与技术、资本相联系的高附加值，但我们（从国家整体或 GNP 的角度看）至少能获得一定的地租、税收，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一大批工人的工资收入。一个农民工由过去的每月 100 元收入增加到每月 500 元收入，的确还不多，但已经上升了一个大台阶，已经开始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这样的就业越多越好，我们有什么理由制定出一些政策去限制其发展呢？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如果不欢迎来料加工型的外来投资，结果就是把这些投资驱赶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到它们那里去创造就业。这正是在这个发展中国家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世界上我们的竞争对手热烈欢迎的事情。

在我们中国的人口和就业压力下，增加就业可能不是个人和企业的首要任务，但它无论如何应该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因为只有政府要为“乡下人”的就业和失业者的再就业负社会和政治的责任。而中国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各种人才都有，我们至少可以同时既积极发展高新科技产业，也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两条腿走路”，在一切可创造就业的地方创造就业，在一切可以赚钱的地方赚钱，特别是不能放弃、拒绝、排斥我们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能忘记我们几亿农民要改善就业状况、加入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任务。

以上的这一切都说明，对于“提升产业结构”这件事，我们必须有一全面的、现实主义的认识。

新经济与旧经济：传统产业在中国仍大有可为

现在“新经济”似乎已经取代“知识经济”，进一步成为国际上最热门、在国际研讨会上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我们国内的媒体和市场分析人员，也在大量使用这个概念，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和潮流。

首先要明确的是，“新经济”这样一个语义含混的词，事实上被人们在不同的场合赋予着不同的涵义。最初，新经济是人们用来指美国经济在近几年所表现出了以下的一种状态：在科技进步和全球化的基础上长期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传统的意义上描述失业与通胀反向相关关系的所谓“菲利普斯曲线”不再适用（因此是“新”经济）。但是后来，随着“网络股”的飙升，国际（国内）的许多人正在许多场合把以信息、网络业为代表的所谓“新科技产业”或“科技板块”称为“新经济”，而把其他所谓的“传统产业”称为“旧经济”。

如何定义和使用一个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要明确一个概念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产生的，指的是什么以及如何关系到我国经济和企业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

就“广义的”新经济概念而言，我们需要认识到的问题是，所谓新经济，主要是以美国经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为基础所产生的概念，指的是发达国家当前的一些经济现象；而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还是不一样的。一般意义上的新经济，即那种持续高增长、低通胀、科技进步快、经济效率高、世界领先、全球配置资源、处处称雄那

么一种经济状态，当然也是我们所梦寐以求的。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可能还是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扎扎实实地做许多打基础的事情。我们也能做到高增长、低通胀，但我们的经济结构仍然会在相当长的时期是发展中国家的类型，我们还不会在高科技发展方面处于领先的地位，我们的资本市场还很不发达，我们还不能在世界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上左右局势。

就“狭义的”新经济概念而言，我们要认清以下的一些问题：

第一，对于一些发达国家来说的“旧经济”，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新经济”。在目前的发达国家，信息、网络等产业之所以被称做“新经济”或支撑新经济的产业，是因为它们的确是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支柱。西方发达国家在住房、汽车、家电、旅游、城市化、高速公路等等所谓的“传统产业”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之后，在人们对住房汽车等物品的消费需求的满足程度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之后，经济增长因需求的制约也就陷入了相对的停滞。若没有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出现，给它们的经济带来新的市场需求，它们的经济就不可能再次快速增长。过去十年信息、网络等新技术革命的出现，对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首先还不是在于提高了工作效率，而在于创造出了一大块新的“购买对象”，即新的市场需求。电脑、软件、多媒体、网络、移动通讯等等这些人们物质、精神生活中的“新玩意儿”，形成了新的市场板块，于是带动了新的产业的发展，使得人们的收入出现了新的增量，并因此又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增长。（全球化使得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有了更大的回报并有了新的一块国际市场，对其经济的带动也是同样的，但我们这里不予分析）。因此，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当前的经济高涨的确得益于那一块“新经济”的出现，而那些新出现的“玩意儿”和产业，

也的确是这些国家的“新经济”(狭义),而其他早已存在的产业,则可以称为“旧经济”。

但是,我们的情况如何呢?我们的经济“起飞”的时间还不很长,人均国民收入还只有 800 美元左右(美国是 3 万元,瑞士是 4 万元),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许多产业刚刚发展。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旧经济”的那些产业,对我们来说还大多是“新兴产业”。比如,汽车业显然还是我们的新经济;住房业刚刚起步,二级市场才刚刚开放;旅游还在起步阶段,而城市化进程还没有大规模展开,我们的各种公共基础设施(这也是最终产品需求的组成部分!)还很缺乏,家电新产品看上去在城市里越来越难卖了,但一方面,刚出现的这一点市场竞争,还属于“初级阶段”,服务改进的速度之慢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我们的几亿农村人口还因就业不足、收入水平低而无法进入家电消费市场(他们不用家电首先不是因为“没电”,而是因为“没钱”)。总之,对其他国家是“旧经济”的许多产业,对我们来说还是新经济。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出现,使我们较早地拥有了一块新的市场需求,这当然是好事,我们也要紧紧抓住。但这种新的市场需求在我们这样的落后国家中,远不如为了其他物质生活水平方面的“补课”所能创造的需求大。在市场需求已经日益显得重要的今天,难道我们还要采取一种放弃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需求的发展战略,把这块肥大的市场让给别人吗(让给跨国公司或其他发展中国家)?

第二,传统产业在相当长时间内仍是我们增长率的源泉。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现在的确是新兴产业在带动经济的增长。比如美国,新兴产业的增长和相关的投资,带动其经济每年增长近 3 个百分点。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新兴产业也发展很快,但由于技术相对落后,体制上也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在可预见的将来,即使我们能够紧紧跟上,

新兴产业能够每年带动经济增长 2 个百分点就已经很不错了。而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只满足于 2 - 3% 的增长，而是要增长得更快，这样才能缩短差距，比如说每年要增长 7 - 8%，那么，剩下的那 5 - 6 个百分点的增长从哪里来？显然还得靠传统产业的增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传统产业的更快增长，将仍是我们较高增长率的主要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放弃在传统产业方面的继续努力，就等于放弃较高的增长率而放弃我们的追赶！

第三，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是不同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最优的产业结构，不一定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优产业结构。发达国家收入和生产成本的提高，使得一些产业不再具有竞争优势，而它们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则可能正是有优势的产业，比如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正可以利用大量闲置的劳动力靠这些产业来增加就业、积累资本、提高技术。所以，用发达国家“新经济”的产业结构来指导我们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是错误的。

第四，我们新兴产业的发展目前还面临许多局限。发达国家的新经济首先是建立在发达的“旧经济”基础之上的；而我们传统产业还没有发展，许多基础的东西还不具备，新经济的发展自然会因此而受到局限。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几百年发展那些“旧经济”的过程当中，还相应地发展起了一套市场机制，包括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公司制度、银行服务和资本市场，而这些都是我们仍然十分欠缺、有待大力发展的。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新经济的发展，所受到的制约就更大。比如“网上交易”，我们就面临比发达国家更多的制约，从“软件”上看，我们的信用卡体系还不发达，持卡人还很少，与信用卡网上支付相关的金融服务保障和法律保障还非常欠缺；从“硬件”上看，我们的批发、零售业本身的现代化程度还不高，邮购、“目录购物”还非常不发达，因此能在网上交

易的种类、规模就会非常有限，如何保证送货就更是问题。目前发达国家的网上购物业务还因为交易规模不够大、送货不及时等问题难以赢利，我们的网上交易的发展恐怕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在经济中起到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第五，在发展新经济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利用“后发优势”，以减少投资的风险成本。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够有较高的增长率并逐步缩小差距，原因之一是因为它们能够利用“后发优势”，可以学习和利用发达国家已有的经验和技術，不必事事自己探索，自己经历每一种市场波动，从而可以大大减少发展过程的风险成本，少走弯路。正因如此，当前正在发生着的新技术革命，包括信息革命和基因革命，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发展和赶超的机会，可以出现跳跃式的发展，所谓传统产业的发展，也会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呈现出新的特点，可以更快、更有效率。对此人们较容易认识。但是人们通常不大知道的是“后发优势”的另一层含义，那就是作为“后发者”，我们可以节省一些创新的“风险成本”。发展中国家穷，资本宝贵，经不起亏损（更不要说长期亏损），选择投资项目，“保险”一些为好，不像发达国家或资本实力雄厚的国际大公司那样经得起“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在技术上没有明显的领先地位，最好不要在一个产业发展的初期“跟着起哄”，在技术进步的前沿上去做过多的风险投资，而是等着一些人先去“趟混水”，然后我们再紧紧跟上（待下一轮技术进步时争取走到前沿去），以减少我们发展的风险成本。比如“网络经济”目前还处在第一轮的技术进步和市场发展过程，多数网络公司还没有赢利，以后如何能够赢利，有多少能够赢利（可以肯定的是大量的现有网络公司会被淘汰），目前还不是很清楚。这时我们如果也学着发达国家那样，投下那么多风险投资，一窝蜂地、过多地、不切实际地搞此类新兴产业，我们的相对成本（投资占我们可

利用总资本的比重)和绝对成本(被淘汰的企业个数),都会比人家高,我们发展的成本反倒高了,增长速度反而会放慢。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政府、学者现在天天在那里大叫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蛊惑力很大,那的确是他们的“兴奋点”所在,是他们所面临的“前沿”。而我们如果也跟着他们的“兴奋点”走,不加分析地去赶发达国家的“时髦”,最后吃亏的只能是我们自己。可以预见的是,当“网络板块”发展第一轮“泡沫”破掉的时候,受到打击最重的一定是一大批落后国家的、不具规模和技术实力的公司企业。

以上这些分析表明,当我们使用外国人大量使用的名词的时候,得先搞清楚那是在说什么,然后再好好认识一下我们的现实是怎么回事,而不能人云亦云,跟着起哄、追风,还得当心别上了“人家的圈套”(他们在努力扩大他们的“新兴市场”!)

上述分析不是说我们不要发展新兴产业,而是说要防止盲目性,防止一窝蜂,防止不计成本,防止再走弯路。在适当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还大有可为,只要我们认真把体制改革的文章做好,在专业化竞争上下功夫,在质量上抓“升级”,这些产业还够我们的企业(当然是真正想发展、想“挣钱”的企业)“吃上几十年”,大可不必都看着某些新兴产业眼红,挤过去冒那份风险。特别是不能所有地区、所有城市、有没有条件的地方和企业都要“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产业”,不能再一窝蜂地赶时髦。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再也经不起折腾、经不起走弯路、经不起用我们宝贵的资本去“起哄”了。

第六,利用网络技术,不等于就是要经营网络公司。

在明确了以上的种种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对新兴信息产业的发展 and 新技术的研究与利用给以高度的重视。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经济学的

意义上所起的作用就是节省经济的信息成本从而降低一部分（不是全部）交易成本。新的信息技术包括网络等等事实上为我们的一切产业包括传统产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我们的传统产业从此可以效率更高。目前信息技术革命还刚刚开始不久，信息、网络产业还刚刚开始发展（第一轮的优胜劣汰还刚刚开始），我们要充分抓住这个机遇，一切传统产业也要积极而充分地利用新的信息技术，改变经营方式，以充分节省信息成本，加速整个经济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现在出现的网络公司中有一大批最终可能不能赚钱，但网络本身总体上说却是能赚钱的，因为它能为我们节省信息成本，也就是能为我们带来效益。“网络”不等于“网络公司”，“上网”不等于经营“网络公司”。充分利用网络，各行各业，一定可以赚更多的钱，整个经济可以更有效率地发展。

创新与引进：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快的科技进步

1、根本的差距在于科技创新能力

从经济上说，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根本差距在于科技创新能力。一个国家如果人均收入不高但科技创新能力很高，它其实不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已经是发达国家。比如日本，二战后它很穷，但很快就成长起来，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大国，那就是因为它战前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科技创新能力，战后穷只是因为它是战败国，而不是因为它是个发展中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抱怨自己在科技研发方面不如发达国家，只不过是说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2、积极发展我们自己的“国民创新能力”

以上的分析也就使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变得非常明确了：我们要想追上发达国家，说到底是要在科技开发能力上追上发达国家。而要想实现这一点，我们自然要从现在起就积极地、尽最大可能地培养和发展我们自己的国民科技创新能力。

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当然是发展教育，不仅是发展高等教育，而且要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在提高广大一般劳动者的教育水平的基础上形成较高层次的科研能力，使广大劳动者真正成为在现代科技条件下有就业机会的劳动力。其次，引进技术、引进资本，学习、吸收别人已有经验、教训的过程，本身也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过程。我们与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水平越接近，才越是具备了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创新能力，研发投入的回报率才会越高。

在这方面，现在应充分注意的问题是：最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能力，一定是“国民创新能力”，即企业与个人的创新能力，国家的作用只是提供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与条件，包括有利于创新与应用的制度条件，而不能再事事由国家组织“攻关”、由国家承担责任。在技术相对稳定、成熟的条件下，在科技创新的目的是非商业目的的情况下，国家组织“攻关”还有一定的意义，在技术革命正日新月异发生的过程中，在技术进步的主要目的是商业竞争的情况下，政府行为就应减少到最低程度。

3、“创新成本”：研发能力与经济实力

这里需要搞清楚的问题在于，一个国家（同理，一定程度上应用于一个企业）的研发能力，既是其经济竞争力的源泉，又是以其经济实力为基础的。

首先，要有研发能力，就要有钱搞教育，不仅是一般的识字，而且要有钱搞得出一流高等大学、研究生院，有充足的国际一流设备，更要有钱养得住世界一流的教授，工资水平能够吸引国际的人材，而不是自己培养出的人材“流失”到国外。而且，当今一国人力资本的水平是过去几十年教育的积累。所以，人力资本水平是以一国几十年以来收入与财富水平为基础的（当然，不同的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同，同等的收入可能有不同等的对人力资本的投入）。

其次，要有研发能力，对一个国家来说，就要有钱搞基础科学研究，而这是一个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只有投入而没有市场回报的公益事业；对一个企业来说也要有钱投入研发，而且往往是长期的投入，不断的投入。

此外，创新是有风险的，因此就还有一个风险损失的问题。据统计，世界上的科技研发投入，只有不到 10% 最后是真正转化成商业价值的，是成功的。这就意味着，要想有世界一流的研发能力，还得有充足的资金，经得起科研失败的损失。

正是因为有这种科研能力与经济实力的相关性，发达国家越有钱也就越有科技创新能力，而越有科技创新能力也就越有钱；落后国家则往往陷入越没钱越没能力、越没能力越没钱的恶性循环。

总之，科技研发能力，不是说要发展就能发展的，科技创新也是有成本的，是要花钱的，也是需要时间的。在讨论一国研发能力的时候，我们再不能“不计成本”了！理论和经验（我们自己的经验）都证明，那是行不通的，难以为继的。

4、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那么落后国家如何才能摆脱上面的那个恶性循环，开始技术进步的过程呢？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减少科技进步的成本。

首先是引进技术。引进技术也是要花钱的，而且，我们不是技术的发明者，我们就要为使用新技术而支付成本费用再加上专利费（还要为此目的支付较高的资金成本）。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来研究这项技术所需花费的代价（要想一想一个国家上上下下为此项技术研发所花的全部成本）比引进费用还要高，就还不如引进更经济合算。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如果我们花了好几年才能研发出一个过时的技术，我们的机会成本就实在是大得难以计数了。在当今国际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没有这种对技术进步不同方式的成本费用加以比较的观

念，就没有资格谈论技术进步。

我们当然希望什么都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但是天下已经有人发明出了很多东西，我们若从头做一遍成本比它还高还耽误时间，为什么非要自己做？如果说我们没有钱去买技术，那么又为什么花更多的钱自己白费劲？如果我们发明出的东西是国际首创、国际一流，成本又比“买”技术更低，那当然是自己发明为好，如果不是这样，在成本上就是不合算的。发展中国家利用低成本劳动力辛辛苦苦扩大出口，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换回技术设备，以缩短差距，走捷径加速技术进步的步伐，而不是自己花费更多的代价。

而且，考虑到在许多领域中（包括信息技术领域）技术进步的风险成本，我们让别人去冒 90% 失败率的风险，而自己利用“后发优势”以节省对我们穷国来说更为宝贵的资金，也是一件很“合算”的事情。

其次是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外资的外溢效应指的是外资在一国的经营活动，会使人们观察到其生产、经营、销售各环节上所运用的技术和手段，使人们能对那些从过去长期经营活动中积累起来的成功经验加以“免费”地学习和模仿，从而加速自己的进步过程。外国直接投资之所以能加速一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这种免费的学习——他们至少可以省出“出国的成本”。

更大的一类可以免费获取的资源是那些非专利性的基础科学与信息。世界上存在着大量的免费可以获得的科研成果，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了解其存在的方式并积极地学习和掌握，不必自己从头搞起，比如，世界上既然已经有公共组织和私人公司即将公布基因密码谱，我们就不必再花费人力物力自己去解读基因密码，而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理解和利用它们。政府应该在搜集国际科技信息上花更多的钱，然后使企业和个人能够免费地自由获取以降低科技开发的成本。提供科技信息这

种公共物品，属于政府的本职工作（如果政府将自己搜集到的科技信息对自己的企业和公众“保密”，那就是政府的失职）。

政府还应做的另一件事是在国际舞台上力争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更多的免费或低成本的技术转让，以减少技术进步所可能导致的贫富差距的扩大。

总之，我们不能因为看到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的重要性就又犯急于求成的毛病，忘记我们的实际条件，又去做那种“不惜一切代价”的傻事。时刻牢记节省成本这个经济原则，包括节省科技进步成本原则，一定会使我们发展得更快，而不计成本只能使我们永远落后。在这里关键的概念就是要综合地（考虑到各方面因素，包括长期因素）比一比哪种技术进步方式更加节约“技术进步成本”，更加“合算”。

正确的发展战略是：我们要从现在起就着眼于许多基础性的工作（比如发展教育和改革科技体制），积极地、脚踏实地地培养、发展我们的国民创新能力，与此同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在很多领域内还是要以引进技术为主，以使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快的科技进步！

要素流动与地区差距的缩小

中央政府最近制定了开放西部的战略与政策，在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一政策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无论从人口的角度看，还是从地域的角度看，中国都是一个大国。于是对中国来说便出现了两个“发展经济学”的问题。第一个是在国际上，如何缩小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第二是在国内，如何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问题具有相同性，又有不同性，而其不同性对于我们思考地区差距问题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本文的分析将表明，中国地区差距的缩小，将取决于以下三大要素：体制改革，资本流动，人口流动。

1、地区差距形成的原因

所有决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都是决定地区差距的因素，包括历史发展的差别；体制差距（市场机制、政府效率等）、教育水平，以及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等等。

体制的差距特别重要。沿海许多地区的发展，并不是因为中央给了多少投资，而只是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体制上比别人占了优势，资金、人才就开始向那里聚集。因此，对于一些落后地区来说，如何在体制改革方面取得进展，是根本性的环节。与其多向中央要投资，不如多要一些领先一步的改革政策。有了较好的体制，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人才可以有人才，否则中央投进来的钱还会转个圈从其他途径投到其他地区

去，建成的基础设施没有企业去利用，也只是一些钢筋水泥而已。

所谓“观念落后”，其实是历史遗留下的某些传统的作用和体制落后的作用共同造成的，它和体制因素有着“共同的因子”。

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在地区差距中自然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第一产业的发展来说，自然条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农业时代，有水的地区自然会较为发达，而戈壁、高原则很难养活众多的人口。矿产资源则是一些内陆地区收入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沿海地区甚至海岛，也可能是矿产丰富的地区。但是，在工业化时代，当运输成本成为重要的经济因素之后，那些不宜于种植业发展的沿海、沿江地区就具有了地理区位优势。无论机械如何发达，水运仍是最能利用自然力而减少投资成本的运输方式。而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在信息的传递方面缩小了地区间的差距，但信息传递的加速不能代替物体（最终消费和投资活动中包括的那些实物）位置的移动。

2、资本的流动

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利润。而要使投资项目有利润，除了项目本身的性质之外，还取决于它的一些外部环境，包括“软环境”和“硬环境”。

“软环境”指的主要就是上面所说的体制和政策。投资项目或企业运行中的“政府成本”（与政府打交道所需支付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政府错误政策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如果太高，可能使本来很好的投资项目变得无利可图。改善这方面的环境，降低“政府成本”，显然要依靠各方面的体制改革。

“硬环境”指的主要是基础设施条件。内陆地区地处偏远，没有一定的运输设施作为前提，投资显然是难以进行的（运输成本高低还是第

二位的问题)。其他基础设施也是这样。改善硬环境，显然需要投资。西部地区过去发展较慢，缺乏资金，因此需要中央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对西部地区增加投入，这是必要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指责投入西部的资金回报率太低，大大低于东部地区，因此认为这种投入是不正确的。这种论点混淆了企业投资与政府支出的不同性质。企业投资当然要以效益为目标，但政府支出，包括在一些地区的基础设施上的投资，还可能具有追求社会平等或追求宏观经济稳定的功能。当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政府的钱原则上说主要就是应该用来“扶贫”的。东部沿海地区投资回报率高，市场上的资源自然就愿意投过去，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也已进入良性循环，这时就不再需要政府的投入。在东西部的比较当中，东部目前已经成了“富人”，政府的钱也就应该停止再给东部，而是要更多地支持资金较少的落后地区。落后地区当前投资回报率低，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基础设施不足，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正是为了改善投资环境。退一步说，政府支出在经济中的比重不应过大，但政府有钱要花，却应该主要花在落后地区，花在“穷人”身上，而不应再给富裕地区锦上添花。这是政府行为的原则。对有些偏远地区来说，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经济回报率较低，但作为一个国家，只要那些基础设施早晚是要建设的，目前为了缩小地区差距的目的而早一些搞，也不能认为是错误的投资。

政府真正应该掌握的原则是：政府支出只限于提供“公共物品”，即主要是基础设施，而不应去搞企业投资，无论是中央政府的钱还是地方政府的钱，都不应再去建什么国有企业了。政府的投资改善了投资环境，今后究竟会有多少市场的资金投到西部去，应由市场决定，由民间的投资者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去决定，而不应再是政府决定的政治行为。“开发三线”那样的事再也不应发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部未来

究竟能有多少投资，西部会开发成什么样子，最终也要由市场来决定，由经济规律来决定，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不是由现在人们的“设想”去决定。

3、地区间的平等最终只能是“人均收入均等”

在讨论缩小地区间差距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有明确的概念和目标。首先必须搞清楚的是，对于一个地理、自然条件差别很大的国家来说，我们不可能做到各地区的“发展水平”相等（比如说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科技发展水平等等），而只能做到“人均收入”均等。而且“人均收入”的概念也要有一个全面的定义，比如说大城市的人，货币收入高，但城市拥挤、噪音大，有些人就宁可少一点货币收入，享受小城市、甚至农村的清静，作为货币收入较少的补偿。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综合收入”的均等。

收入的均等，可以通过“资本流入落后地区”从而提高地区总收入（人均收入分式中的分子）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人口从落后地区流出”来实现，也就是通过缩小“人均收入”这一分式中的分母来实现。这正是过去 20 年已经发生、今后更应继续发生的。这里的基本逻辑是，有些地理、自然条件是无法改变的（改变的成本太高）；有些过去在历史上适合农业发展，从而养活了大量人口的农业地区，发展现代工业和其他产业因受地理条件的制约而成本太高，从而限制了收入的增加；这时，解决地区差距的基本途径就是人口的流动，即人口向经济发展较快、收入较高的地区流动，以使地区之间的收入实现均等化。在这方面可以举美国的例子。美国各地自然地理条件很不同，发展水平也很不相同，中西部、洛矶山脉地区连农业也难发展，但美国基本上不存在所谓“地区差距”问题，原因就是人口的不断流动，低收入地区的人们不断向高收

入地区转移，使收入均等化（货币收入的差别由其他因素所弥补）；中西部地区工业不发达，但人口也少，结果在那里的人收入也不低。事实上任何大国经济的现代化都意味着人口分布的重大变化。人口的流动还有利于打破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民众中存在的传统习惯，促进新观念和新体制的发展。

总之，要想实现地区间的收入均等，就要使生产要素，无论是资本和劳动，都能流动起来。

4、积极促进劳动力和人口的流动

在人口流动的问题上，目前仍存在着许多的障碍，包括观念上的障碍。内陆地区的人当然想发展自己的家乡，而沿海地区的人则认为沿海地区已经很拥挤了，排斥外地人的进入。在这方面我们的确需要转变观念。对于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来说，整个中国都应是我们自己“挣钱的地方”，也是别人“挣钱的地方”。中国的沿海地区的确已经人口不少了，但中国人口这么多，地区差距这么大，“命中注定”沿海地区要更加拥挤，必须更加拥挤，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否则就无法实现地区之间的收入均等，无法实现社会的公正。我们现在当然无法断定沿海地区还应吸收多少外来人口，但目前还在进行中的人口流动无论如何预示着中国的人口布局将发生进一步的改变。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内部地区之间的关系与国际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差别，其根本之处就在于一国内人口是可以流动、迁移的，而国与国之间是不准许自由迁移的，至少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是这样。发达国家也许只欢迎少数有专业知识的穷国的人流入（当前它们正你追我赶地吸引中国和印度的人才），而教育水平低的一般劳动力是禁止流入以防他们抢了本国劳工的饭碗的。正因如此，国际上的

贫富差别是很难克服的（如果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的话）。而一国内之所以可以做到消除地区间的差距，最终的原因就是一国内的公民可以自由流动和迁移。

要促进人口的流动，当然还必须改革有关的体制。首先要在宪法层面上规定公民在各地区之间自由迁移的权利；然后是要根据不断发展的形势，逐步改革诸如户籍制度、教育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之类的具体制度，以适应人口流动的现实。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应放在最后，因为这是防止人口迁移速度过快、大批农民失去基本生活保障、防止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基本社会保障制度。

总而言之，要想最终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实现人均收入的均等，体制改革、资本流动、人口流动，三者缺一不可。所谓依靠市场机制缩小地区差距，说到底就是要使各种要素流动性提高；而中国未来经济、社会、人口格局的改变和地区差距的缩小，正是在各种要素的流动中才能最终决定和实现的。

城市化：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中心环节

1、重视城市化水平过低所产生的问题

过去 20 年，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的一个因素是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农村工业的发展。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不仅使 1.5 亿 2 亿农村劳动力开始进入非农产业，收入得以提高，而且使中国的市场得以扩大。

但在另一方面，以劳动者离土不离乡为特征的“农村工业化”过程，也导致了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工业化水平高于城市化水平。到 1999 年底，将所有农村人口中在乡镇企业中就业和农村从事个体运输、商业、工业、服务业的劳动力全部包含进去，目前我国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约为 53%；而包含外来常驻人口在内的城市人口，只占全部人口的 32%。也就是说，我国工业化（非农产业化）的比率，高出城市化比率约 20 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历来是城市化水平高于工业化水平；目前国际上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比较其他国家，在同等的人均 GDP 水平上，我们的城市化水平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农村工业化，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好处是，第一，由于农村工业利用的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劳动成本相对更低（对比城市职工的工资、劳保费用），使中国经济发展在初期阶段的资本积累得以保持较高的水平。这对于解释过去 20 年的高增长率，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二，避免了经济发展初期快速城市化所可能导致的城市贫困化问题。从一定

意义上说，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在经济发展初期实行农村工业化，具有必然性，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因此，现在讨论城市化还是农村工业化问题，并不意味着批评过去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对此必须用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

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了今天的水平，我们就必须对城市化水平过低所带来的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这些问题包括：

第一，公共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低，非农产业效率难以提高，发展速度受到限制。城市化程度低，人口和产业聚积程度低，导致工业和其他各种非农产业的发展所必须支付的基础设施成本过高，交通成本也相应地过高。基础设施的规模效益是资金缺乏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重视的一个因素。在广大的地区里处处建工厂、处处建小城镇、搞“开发区”，必然造成极大的浪费，最后拖了整个经济发展的后腿。

第二，缺少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人口聚集效应，使生活各个方面难以社会化，各种服务业就难以发展，就业也就难以增加；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就会放慢。这正是最近几年我们所观察到的阻碍经济增长加速的现象。

第三，特别值得提出的一点是城市化与国民教育水平提高的关系。分散居住的农村和小城镇，使得教育设施和教师的利用无法形成规模效益，教育投入不少，但效率不高，不仅导致农村教育水平低下，也严重阻碍国民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这对经济长远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不利因素。

因此，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到了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发展阶段了。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中，城市化进程将在过去农村城市化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2、城市化要求有大城市的发展来带动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城市化最主要的效果是“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益”。正因如此，城市化进程应该首先着眼于大城市的发展；随着大城市的发展，周边小城镇也会相应地有所发展，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还会有“城郊市区”（或称“市郊化”）的发展，但那只是大城市发展的带动和延伸，而不是以小城镇为核心搞城市化。中国的小城镇也需要有一定的发展，实现现代化，但有些小城镇在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大城市之后，也许是要消失的。小城镇不仅不能替代大城市，而且在综合效益上也不如大城市。根据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博士的研究，将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人口健康水平、环境污染、交通状况、占用土地等指标总合在一起加以比较，我国人口在 100 万 - 400 万左右的城市综合效益最好，而小城镇的综合效益是最差的。国际上的一些研究也表明，过去 100 年来大城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问题，但总的来说大城市甚至是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综合效益，也要比小城市好。尽管收入水平和交通、通讯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或住宅区有了更快的发展，但第一，这一发展阶段总体上来说，离我们还较远；第二，这一变化本身应看做是大城市发展的一部分，而不能证明我们应该不发展大城市而只去发展小城镇。

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小城镇，以及中国的农村地区，都需要发展，都要实现现代化。但农村的现代化的前提是农村人口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的前提是现在的农民大多数都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留下的少数农民才能不再因“地少人多”而收入低下，才能进入“地少人更少，收入更高”的阶段，才能使农村生活现代化、城市化。而这正是非农产业的发展和非农就业的增加。根据前面的分析，这又是以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为前提的。这就是说，为了使我国农村有朝一

日也能实现现代化，我们现在必须首先加速城市化的进程。没有城市化，中国不可能有农村的现代化。

3、城市化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心环节

下一阶段中国以城市化为主要动力的工业化（非农产业化）过程，正是更多的农民转移到收入较高的非农产业中就业的过程。而这种收入提高的过程，也正是有效需求增加和市场扩大的过程；是九亿农村人口逐步（可能需要 50 - 80 年的时间）被融入现代化经济增长和现代市场中来的过程。现在我们发愁许多产品卖不出去、许多生产能力过剩。但是，从长远来看，只要农村人口真正开始在城市化进程中获得收入较高的就业，我们现有的生产能力就可能还是要大大扩大的。举例来说，农民现在不买家用电器，首先是因为他们“没钱”，而不是因为农村“没电”。

从各方面的分析来看，城市化不仅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大力推进的一项事业，而且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中心环节，抓住这个中心环节，我们就可以有就业的增长、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国内需求的扩大、教育水平的提高、健康保健、环境保护的改善，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正因如此，城市化应成为我们下一五年计划和长期发展规划的核心内容之一（另一个核心内容应是体制改革）。

至于如何推动城市化发展，则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自然形成的一些城市自然应该成为城市化的重点。已有的特大城市可能本身已难以继续扩大，但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带”或“城市群”，仍可能是有意义的。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的一大批小城市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出一大批大城市。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今后五十年再出现 50 - 100 个 200 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并不算多。真正

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城市本身意味着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的形成在很大意义上属于“公共物品”的供给，尽管许多公共物品的生产本身可以由民营部门完成，但仍需要有政府的组织与规划。中央政府就在集思广义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规划，统筹布局，以防止各地出于各自狭隘的地方利益，谁都想把自己的城镇或城市“做大”，产生各种资源浪费和资源配置无效率。此外，尽快进行体制改革，确保人口流动性的提高，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性的提高，是促使资源合理配置，使城市布局符合经济规律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前提。

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的出路在于非农产业化

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而且是一些基本的难题。目前农村大多数劳动力仍然从事农业，收入的来源也主要是农业活动；而中国的农业又受人多地少之困，难以开展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技术落后，人均劳动收入也非常低；扩大农业产量，市场容量却有限，价格下降又使农民收入不能提高；遇到天灾，价格上升，产量却下降，收入也不能提高。结果，城乡收入差距过去一个阶段具有拉大的趋势；收入不平等造成的社会问题（包括由地方政府“乱摊派”、“乱收费”所引起的问题），日益显现出来，成为今后发展的一个潜在隐患。

所有这些问题似乎形成了一个怪圈。而最重要的是，想在与农业有关问题的范围内做文章以求解决以上的问题，目前看都是难以奏效的，或者是难以实施的。我们不妨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一些分析。

第一，关于规模化、产业化经营。许多人都认识到家庭经营规模小、效益差是当前中国农业的一个问题。但是，中国农业经营规模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甚至不是一个组织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在五亿劳动力、九亿人口仍然依靠农业为生的情况下，少数人的“规模经营”，意味着多数人“无地经营”。因此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人口的问题、一个就业和收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也就是在许多人离开土地之前，这个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在某些沿海地区，正是由于人走了，规模经营才开始实现了）。

第二，很难靠提高农产品价格来维持农民的收入。中国国内市场的

农产品价格已经大大高于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在加入 WTO、进一步加入国际市场的前提下，维持这种高价已经成问题，更不要说再进一步提价了。而且从国内市场本身的供求情况看，目前的市场价格在相当一段时间可能都难以持续提高（不因进口增加而趋下降已经不错了）。人为地提价，只能使供给扩大而迫使市场价格下降。在这里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想保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尽快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保持我们的国际竞争力，我们还不能人为地把农产品价格维持在大大高于国际价格的水平上。这是因为，食品价格是决定非农产业劳动力成本的重要因素，劳动力成本越高，我们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越低。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劳动力成本较低这一比较优势，进一步提高农产品价格对我们的经济整体发展是不利的。国际上一方面有人（主要是农场主集团）希望中国开放农产品市场，而另一些人（主要是工业集团和劳工组织）则巴不得中国封闭市场，搞“粮食自给自足”、“自己养活自己”，因为这样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就会因农产品成本的提高而提高**，对他们的竞争力就被削弱，他们的就业就可以保住。都是有他们的利益在背后的。而比较符合我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能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的做法是，将农产品价格维持在现有水平，当需求扩大时，如遇供给不能跟上的情况，就靠扩大进口来弥补不足（目前我国进口粮食只占总消费量的 1%左右，进行适当调整而又不损害“粮食安全”的余地还很大）。但是显然，在农产品价格问题上做文章，已经不能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其他产业的问题。

第三，土地承包制在相当长时间内还不能变。与规模经营相关的问题是土地制度问题，这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一些争论。但是，就目前土地收益状况和农民收入结构而言，农户承种的那一小块土地，已经不是“高收入的来源”，而是“**社会保障**”（“保命田”）。有了这样一块强制

性地不可出买、不可转让（当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转租）的土地，至少为农民提供了基本收入源泉，在农民在无法找到其他收入更高的工作之前（如进城务工或乡镇企业）或者又失去了收入较高的非农就业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避免中国陷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所发生的“城市贫民”问题，在中国的经济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多数农民已经在非农产业中获得了稳定的就业之前，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不应发生重大改变的。

从以上三个“不是出路”的问题的分析中，我们自然可以看到出路何在：中国农业问题以及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即农村人口就业的非农产业化，或称“农民的非农产业化”，也就是多数以至绝大多数农民（80%以上）最终都能在非农产业（工业、服务业等等）中获得稳定的就业。说到底，中国的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的本质是农民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使多数农民不再是农民！依赖于土地的人少了，土地的使用和农业的经营才能更有效率，农业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农产品的价格也才能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应有的变动，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才能从专业化、大规模的农业经营生产活动中获取更高的收入，农业和工业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才会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才会缩小。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真正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现在反倒应该更加关注、更加重视如何发展工业、发展非农产业的问题，更加重视这些产业如何能够为广大农民提供更多的高收入就业，使这些行业所能提供的就业迅速增加（而不是像最近几年增速趋缓）。这里要认识的一个基本经济规律是，当人们解决了吃饭这个基本的生存条件之后，生活水平的提高，即收入的提高，国民总产值的增长，整个经济的发展，就不再主要取决于农业的发展（虽然仍然要以农业为

基础，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是这样)，而是取决于我们生活消费中其他非农产品的增加，如衣物、住房、电器、交通、通讯、旅游、娱乐、公共基础设施，等等。这时经济发展或经济现代化的基础标志就是从事农业活动的人数和时间越来越少，而人类的其他活动越来越多。只有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的这一基本趋势，并由此出发制定我们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我们才能逐步从根本上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短时期不能完全做到的事，不等于现在可以不去努力朝那个方向发展；只有现在开始努力了，最终才能积过去之努力而解决问题。短期内的政策制定，必须与长期发展战略相适应、相衔接，才能保持持续发展势头，不因当前的短期需求而耽误问题最终获得解决的进程。

发展民间金融与金融体制改革

最近几年，在深化体制改革、保持经济增长、克服通货紧缩的过程中，人们的眼光已越来越多地转向了民间投资，扩大民营企业融资的问题日益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发展民间金融的问题日益提上了政策研讨的日程；而加入 WTO、进一步对外开往的前景也引起了人们关于如何“对内开放”问题的讨论。的确，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问题值得做进一步的分析与探讨。

1、改善资源配置

发展民间金融，扩大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不仅是扩大民间投资、增加就业的需要，更重要的，它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进一步发展、健全的需要。

在我们的经济中，目前非国有经济对 GDP 贡献已达 63%，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已达 74%，而在全部银行信贷资产中，非国有经济使用的比率不到 30%，70% 以上的银行信贷仍然由国有部门利用（证券市场上的直接融资也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而国有部门目前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只有不到 30%。这种情况的后果，自然是一方面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存在大量的坏账，而另一方面则是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渠道不畅，制约着整个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制约着金融市场的成熟和发展。纠正资源配置的上述扭曲，显然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2、发展市场竞争与改善市场管理

发展民间金融，也有利于发展金融业的市场竞争和对竞争的管理。过去 20 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竞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and 它们带来的竞争机制。但是，过去我们积极在制造业发展民营经济，引入市场竞争的同时，却忽视了在金融市场上发展民营经济和市场竞争，致使在金融领域内仍是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处于垄断地位，竞争严重不足。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对金融市场进行规范、管理的发展与成熟。其原因在于：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水平，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展开而逐步提高的，管理者只能随着被管理者的成长而成长；只有市场竞争主体发展了，竞争存在了、展开了，管理者才会知道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应该管什么、怎么管。

3、全面理解金融体系和民间金融的地位与作用

所谓金融市场或金融体系，从企业融资的角度看，包含至少两个组成部分，即为企业直接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和为企业提供银行服务和间接融资的银行体系。

3.1 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是企业初创时期的主要融资方式

长期以来在观念上存在的一个“误区”是，以为所谓企业融资就是“借钱”。而实际上，对于新生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来说，既没有过去的“信用历史”，又没有财产可以抵押，靠借钱使企业开始起步，是极为困难的。这当然不否定向亲戚朋友借一些钱作为初始投入，曾是我国的许多民营企业的起点。但世界上多数企业的最初资金来源，要么是自己的积累，要么是别人的“直接投资”——不是借了要还的“贷款”，而是投入企业同时拥有一部分产权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并不需要信用历史和财产抵押，而只需要：第一，对经营者人格的信任，

相信他创办企业的目的不是要“骗钱”，而是要发展，相信他会兢兢业业地办企业；其次需要的是对投资项目本身赢利前景的相信，尽管人们都知道投资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这里的融资渠道，其实就是资本市场，不一定是狭义的“股票市场”，却是广义的资本市场（股票市场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现在变得非常时髦的“风险投资”，其实历来是中小企业所能获得的主要资金来源。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金融体系中所缺乏的，首先还不是缺少民间银行，而是缺少一个多层次的、能够为广大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我们现在有了两个全国性的股票证券市场，可以使少数（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直接融资，但是多数其他企业，特别是大批刚刚起步的中小企业却仍然无法融资。即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了全国性的“创业板”市场，但若就此为止，我们这么大国家这么多地区的那么多中小企业，还是不能获得应有的融资渠道，更何况我们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是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改革产生了许多“股份”，各种产权能否转让、买卖，不仅关系到企业改革能否继续深化，而且关系到那些已经改革了的企业能否开始成长。

因此，我们现在不仅需要树立起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概念，而且需要尽快根据我国特殊国情（企业多、地区差距大、企业改革的情况复杂），建立起一个“多层次、多渠道”的资本市场，使得各种投资活动得以展开，使得大批中小企业得以发展。

3.2 银行所提供的首先应是金融服务而不是投资信贷

在有关银行体系的问题上，过去存在的一个“误区”是把银行业主要当成是投资资金的来源，而在实际上，银行业首先是“服务业”，服务于企业之间短期的资金周转。人们需要银行，首先不是因为没钱要借钱，而是有钱要存放、要支付、要完成交易所需的资金往来。首要的一

种“借钱”行为也是由于在售出贷款或生产资金没有收回之前需要银行给予一些短期的流动资金信贷。无论如何，短期流动资金信贷也是银行业务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国大量中小企业目前最缺乏的其实也是这种银行服务（特别是缺乏由地方性小银行提供的成本较低的金融服务）。

当然，银行也可以成为长期投资信贷的来源，过去我国因为缺乏资本市场的发展，银行更是要作这样的工作。但是，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银行在这方面的任务将大大缩减。

4、中国需要大批的中小型、地方性、民营金融机构

现在有些人在担心中国的银行规模还不够大，加入 WTO 后难以与国际上的大银行竞争。

但是，首先，竞争力的根本在于效率，有了效率可以由小变大，而没有效率，拼凑出一个大机构，早晚也会被挤掉、被淘汰。

其次，世界上的那些大银行，不仅本身是由小银行发展而来的，而且即使发展到了今天，在我们看到的少数大银行的后面，还是有许多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存在（美国有 2 万多家，意大利有 9 万多家），发达的市场经济内部，都是一个由少数大银行和一大批中小银行形成的金融体系，分工合作，提供各种金融服务，保证着经济的有效发展。

大银行有其规模经济效益高的一面，也有其交易成本高、管理成本高的一面。因此，大银行也许更适合于为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而不适合于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1998 年以来我国政府鼓励国有大银行为中小企业增加贷款，但因种种原因难以施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银行获得中小企业信息的成本较高，审批程序较长，利率低了无法贷款，高了小企业又难以接受。加上国有银行的一些特殊问题，困难就更大一些。

而对于一个人均 GDP 只有 800 美元左右、八亿农村人口有待进城、

五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仍是大量的地方性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也需要有人为其提供金融服务。但一方面，我们本国的大银行很难对它们提供这种服务，另一方面，外国的大银行进了中国，也不会、不愿、不能为我们那些大量的地方性中小企业去提供服务，而只有一大批地方性的、“土生土长”的中小民间金融机构，才能胜任这一工作，与地方性的中小民营企业共同成长。这当中的合理性在于：决定金融服务业发展的根本因素是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信用；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最能较充分地利用地方（以至社区内）的信息存量，最容易（成本低）了解到地方上的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项目前景和信用水平，最容易克服“信息不对称”和因信息不完全而导致的交易成本较高这一金融服务业的障碍。地方上的人们自然知道地方上谁的“生意好”，谁比较讲信用，可以省去大量调研费用，也可减少审核批准程序，从而使金融业务的成本较低，服务价格自然也就较低，使供求双方都能发展。正是这一经济合理性，使得地方性的小银行可以有稳定的服务对象和市场基础，与国有大银行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就像大企业和小企业可以各得其所、各有各的市场一样。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该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首先想想清楚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面临着几类不同的问题，想一想一类金融机构或一级金融市场能否满足我们所面临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多种需求，适应多种经济主体发展的需要。如果我们的心目中只有少数几个大企业、大银行，那就大错特错了！

5、发展民间金融本身要求发展对它们的监管

发展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市场，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发展民营金

融机构，包括非国有的投资公司、投资基金、投资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等等，也包含民营银行、保险公司等。而一谈到这些具体问题，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民间金融的风险问题，包括它们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所带来的风险。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发展民间金融本身的涵义当中就包含着发展对民间金融的监管。金融业是个风险较大、容易出现“欺诈”行为的行业；任何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都是需要监管的，不监管等于不去发展。过去我国已经出现的一些民间金融（这里首先是指一部分合法的股份制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等）之所以后来问题较多，不是因为这种经济形式本身有问题，而是政府（或社会性金融组织）没有对其进行应有的监管。我们过去不断地把国有大银行纳入正规的监管系统（同时使它们享有事实上的存款担保），而对民间金融则是让其自生自灭，或者一出问题就想到关掉它、并掉它，没有对其给以足够的关注和管理，其结果自然是要么“不清楚它们是怎么运行的”、“为什么运行（目的是不是就是‘骗钱’）”，要么就是问题出得较多，成为金融风险较大的一块土壤。正确的做法是在让其大力发展同时将其纳入严格监管的范围，而不是要么不管、要么不与其发展或是宣布其为非法、或是出了点问题就关掉了事。世界上的大多数银行都是民营的，而它们能够健康地发展壮大，原因之一是它们被纳入政府（代表社会）对其进行监管的体系之中。从监管难度上说，民间金融实际上要比国有银行更加好管，因为你可以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严厉的、有经济意义的惩罚，甚至把它关掉，而对国有银行，多数经济惩罚措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对官员的“行政惩罚”还有些意义），也很难对其实施破产性处理。

在建立金融监控体系的问题上，制度设计的前提就应该是假定人们想“投机”、想“骗钱”，而不是假定人们会“出以公心、为经济服务”，

只有这样，我们的监控制度才能真正做到防范“骗钱”的人，不令其得逞。而不是出了骗子就大惊小怪。一切制度的功能其实首先都是“防小人”，使小人受到惩罚，讲信用、做“正经生意”的行为才能得以发展。在建立对银行的监控体系的同时，我们也要进一步发展对合法、正当银行行为的保护与保障，比如通过法治对“赖账”行为进行打击和惩罚，通过提供“存款担保”，对一般性的金融风险加以防范。

6、重视基础性的体制建设

现在在国际上八面威风的现代大金融机构都是由几十年、几百年前的一些很小、很“土”的机构发展而来的。在少部分金融机构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情：第一，在大量金融机构出现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竞争性、优胜劣汰的金融市场；第二，在多次金融骗局、金融危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银行监管机制和相应的法治体系；第三，形成了商业道德或商业信用；第四，在新技术基础上，形成现代金融业务；第五，在以上各种发展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和新的金融市场（期货、股票市场、投资基金等等都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

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然不必什么事都自己重新做一遍，什么“金融骗局”都要经历一遍。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借鉴和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借鉴它们已经形成的体制模式和管理机制，一开始就可以起点高一些，一上来就可以也搞一些现代的、新型的东西，如电子银行业务、投资基金、股票、期货等等。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不能忘记那些基础性的、根本性的东西，关键是不能忘记我们还有许多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尚待完成，那就是金融市场上的竞争、监控体系、法治结构、以及“信用文化”等等。发展地方性的民间

金融业，也是建立市场经济金融体制的基础性的过程，因为，第一它是发展健全的金融场所不可或缺的，第二它们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有利于上述几种基础性体制的建立。

由此而论，我想这里所涉及的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问题：我们作为市场经济的“后来者”，在国际上看到的往往是人家发展到今天的“现代的”东西，而往往忽视了这些“现代的”东西是建立在以往多年形成的许多“基础性的”东西之上的；没有那些基础性的东西，“现代的”东西不可能良好地有效运转。忘记了这一点，老是想一下子只搞现代的东西，其结果不仅到头来不能走捷径，相反，却会不断地走弯路。

最后，再要指出的是，有的人很着急，不相信发展那些地方上的“小东西”会有什么大成果。在此，我们不妨回想一下80年代、90年初发展地方民营中小企业的例子，那时很少有人真正把它当一回事，没想到它们今天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发展民间金融情况也会是一样。只要体制更有效率，有其经济合理性，早晚会成大气候。

体制改革、宏观调节与长期增长

为了使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增长，我们一方面要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改善经济的效率；另一方面要采取正确的发展战略。从长远看，这是两个最基本的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既防止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又防止经济下滑、通货紧缩。经济过热、经济增长率过高导致盲目投资，经济增长率过低则导致生产能力过度闲置，都导致资源利用效率的下降，都会使我们总体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使发展的速度放慢。

这里需要着重认识的问题是，体制改革本身可能引起经济波动，需要用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其这种作用加以“抵消”，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比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放权让利”、扩大地方政府自主权的改革，加上许多市场开放初期难以避免的盲目性，导致了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的经济过热。而到了90年代下半叶，由于深化企业改革，控制银行坏账，职工下岗，以及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导致信贷相对萎缩（“银行惜贷”），投资和消费增长率下降等一系列现象，引起通货紧缩、经济增长率下滑。

所有这些都不意味着改革“搞错了”或“搞多了”，相反，这些改革都是必须进行、应该加速进行、深入进行的，只不过这些改革就其所具有的历史背景和所面临的现实困难来说，都不可避免地对宏观经济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旧体制改革了，新体制刚刚形成，发展到正常运转阶段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经济的运行难免就会出现

一些不稳定的情况。所以说，出现一些不稳定，其实可能正说明体制改革在深化，在向前推进，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不过以上的分析说明，那种认为要“通过深化改革实现经济稳定”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似是而非的。从长远看，当然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建立起较完善的市场机制，才能最终减少经济波动的程度（市场经济本身不能消除经济波动，也需要有宏观调控，只不过它比我们过去实行的计划经济所导致的波动小一点、效率高一些）。而就短期来看，体制改革不仅不一定会使经济稳定，相反，它本身可能就是一定时期内经济发生波动的一个原因。这不否定有些体制改革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会对经济的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比如在通货膨胀时期，改革银行体制、控制贷款增长；在通货紧缩时期积极开放国内市场、发展民营经济，等等，在一段时间之后都会对经济的稳定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在“这一段时间内”，由于新体制还比较弱小，难以在宏观层面上发挥作用，两三年甚至四五年内还很难指望它们在宏观稳定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以上的分析所能说明的是，采取适当的宏观政策以抵消经济波动因素的必要性。市场经济条件下也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以“熨平”经济波动；在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导致经济波动的因素更多一些，就更需要认真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密切注视宏观经济的动向，采取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使经济能够平稳和持续地增长。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是其他经济政策所不能替代的。

从另一方面看，实行宏观调节政策，丝毫不否定应该加速进行改革。二者应该并行不悖。宏观政策的作用只是对总供求关系进行一定的调节，根本起不到改革体制的作用，更不能替代改革政策。它只是在短期内抵消一些引起经济波动的因素，而只有改革同时深入进行，才能尽快使新体制发展起来，使经济的不稳定性从根本上得以缩小。那种认为利用宏

观政策调节经济就是否定改革必要性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下滑、通货紧缩，有利于改革的深化，因为在不景气的时候，人们不得已而只能走改革的道路。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因为一般说来改革都是“逼出来”的。正因如此，通货膨胀、经济过热，肯定不利于旧体制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新体制成分的成长）。但是，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说经济越下滑越好，根本“不用担心”，经济增长率再低也没有关系的结论，就是错误的了。中国经济不能不改革，中国经济也不能不增长；不增长我们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从长期看，比起五亿农民就业、九亿农村人口这样的长期的大问题，国有部门的改革只是一个短期的问题。更何况经济持续下滑（近几年若不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经济不知已下滑到什么程度了），就业持续下降（还不仅是国企职工下岗），我们金融体制的问题、社会不稳定的问题都会迅速恶化，经济改革也难以顺利进行。经济学家如果可以不顾经济增长，那么就可以不要经济学了。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体制的成长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在此过程中，各种导致经济波动的因素都会出现，都需要认真加以对付。经过过去几年的调节，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摆脱通货紧缩，进入正常增长，但这不等于说一切可能引起通货紧缩的因素都消失了，也不意味着不会再出现引起通货膨胀的因素。中央政府（宏观调节是中央政府的任务）必须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提高宏观政策的研究水平，提高宏观决策的及时性和正确性，逐步掌握对经济增长实行“微调”的“艺术”，尽可能地使经济不再出现过去的大起大落，才能使我们的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尽快地追上先进国家的水平，实现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目的。